

我们的乡村

Our Village, Our People
Proceedings of the Silver Lake Salon

银湖沙龙/出品



我们的乡村

Our Village, Our People
Proceedings of the Silver Lake Salon

银湖沙龙/出品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的乡村 / 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 银湖沙龙出品.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 - 7 - 5136 - 4076 - 3

I. ①我… II. ①中…②银… III. ①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1487 号

责任编辑 赵静宜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巢新强

封面设计 久品轩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6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

定 价 56.00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8179 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5416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88386794

序

PREFACE

银湖沙龙中的乡村

李津逵 龙 隆

在一个被宣布为“没有农民的城市”里讨论乡村问题，是不是有点矫情？银湖沙龙近年来不断地推出有关于乡村的主题，说明深圳这个城市化冲在最前面的城市，既无法摆脱，也不能不回望中国的乡村。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深圳这个中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方，恰恰把乡村哺育城市的作用展现得最为充分。刘宪法教授曾经发问：一个农民来到陌生的城市第一晚住在哪里？是的，他们住在老乡的家里。乡村织起了一张网把许多城市都罩了进去，闯城市的农民就可以在这个网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脚点。

农业文明时代，深圳所在的珠三角拥有中国最先进最传统也最与国际市场接近的乡村。在改革开放推动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大潮中，深圳的乡村又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不足30万人口的原住民以他们自发的民间城市化有效地配合了经济特区的国家城市化。当政府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三通一平的

时候，深圳的农民集体也在抢抓机遇，他们重修祠堂凝聚向心力，吸引当年逃港的乡亲回家举办“三来一补”加工业，在全国一刀切地取消人民公社解散集体经济的80年代初，他们创造了集体股份合作制，将村落的土地用股份合作的方式整合起来，按照商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做整体规划，将自己的家园建成为可以容纳数十倍于本村人口的多功能综合性的城市组团，这种被称为“城中村”的城市组团，哺育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奇迹，并且成为全世界大都市中低成本生活区的典范。

深圳是珠江三角洲乡村的孩子，城中村是深圳的奶娘。关心深圳前途的人必然会关注乡村的未来。迄今为止，中国鲜有世界级的名城，但中国拥有世界级人口和经济体量的名村。可是随着城市的迅速崛起乡村正在渐次的衰落。特别是从今往后，伴随着改造与建设，乡村社会和乡村生态正面临严重的威胁。以往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繁荣的乡村，城市的繁荣难以持久。

本辑是银湖沙龙关于乡村建设若干讲题的选编。作为一个民间公益性学术平台，银湖沙龙在十年时间里得到来自深圳各界朋友的关注和支持，最大的支持就是介绍不同领域里特立独行的实践者来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党国英教授对于传统集体经济利弊的反思是基于他多年在全国各地农村的调研；王金红教授关于村民自治何以陷入困境的见解来自于一线一手的观察；牛见春教授提出中国民间的“崇拜”基于现世功利目的而有别于探索生命意义的信仰，是他20年间在我国西南西北乡村深入调查研究、参与建设的总结；梁鸿教授在城市化大潮下为乡村发出的呐喊也是她最近多年里回到故乡、追踪乡亲们走南闯北的脚步而从心底发出的；生于眷村长于眷村的刘台平先生以自己半个多世纪的亲历揭示给我们一个台湾战后重回中华文明的秘密；而张志敏老师，这位通晓多门外语为我国外贸做出可贵贡献的业务尖子，在土地上耕读15载，白天常常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生态学者，夜晚每每捧读中国的传统经典，她

关于“农业是管理生命的艺术”的观点是用生命在讲；来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起点蛇口和第一辐射源香港，招商基金会黄奕副秘书长和香港 IDEA 团队介绍了他们在乡村所做的公益实践，他们关于“利己利他”的公益理念，和发动当地各界共同参与的经验，都为我们这些城里人如何到乡村去做正确的事，并且把事做正确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借鉴。

其实，深圳的“小渔村变身一夜城”的神话在百年前的中国沿海曾经反复上演。深圳不过又一次向我们证明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一旦融入全球化可以取得怎样的发展速度，证明城市的现代化指日可待。但是，自从百年前中国沿海成为“万国城市博览会”以来，历经几次大的起伏，现代化的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始终在寻找到一条良性循环、相得益彰的途径。对于许多深圳人来说，乡村是回不去的梦，但假如连梦都没有，这个城市就不配做一个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我们欣慰的是，银湖沙龙近年来讨论乡村的话题不断，而且不乏应有的深度；我们更加欣慰的是，许许多多银湖沙龙的参与者，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反哺乡村、投入乡村、向乡村学习、与乡村分享成长的感悟。他们中间有些此刻正在福建培田致力于乡村建设，有些正在和平山区助力乡村教育，有些正在用脚丈量一片乡村的山水，用心画出那里的发展蓝图，有些正在深圳的城中村、打工者聚集区里和年轻人交朋友，间接地回馈着一方方从未谋面的故乡。

如何在城市化的大潮下令乡村与城市共同繁荣，这是中国的世纪难题。这个难题不解决，中国的复兴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我们向所有银湖沙龙的发起人、热心参与者和支持者表达深深的期待，我们期待着未来关于乡村的实践和讨论持续下去。在中国城乡关系随着城市化的进展而不断调适和改善中，在各地不同的传统与条件下走出精彩纷呈的道路上，尽一份独特的力量。

目录
CONTENTS

| | |
|--------------------|-----|
| 序 | 1 |
| 集体经济与集体产权——珠三角农村转型 | 1 |
| 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理论反思 | 19 |
| 村庄的精神——民间信仰与崇拜 | 41 |
| 如何回到故乡 | 63 |
| 我们的乡村 | 79 |
| 台湾眷村的角色 | 109 |
| 公益、传承与农桑——第三只眼看台湾 | 135 |
| 农业是管理生命的艺术 | 161 |
| 后记 | 185 |

集体经济与集体产权
——珠三角农村转型

我们
的
乡
村

第 105 期银湖沙龙

时 间：2013 年 8 月 31 日

主讲嘉宾：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主持 人：刘宪法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党国英 今天的主题，第一是农村传统集体经济制度的本质与形式，第二是谈它的危害，第三是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先讨论集体经济制度的本质。

物品分为公共品和私有品。资产和物品其实不一样，资产分为公益性资产、盈利性资产和房地资产。房地资产是什么？不是公益性资产，也不一定是盈利性资产。比如说农村宅基地，它是盈利性资产吗？多数情况下不是。传统集体资产是不稳定的“共同共有产权结构”之下的资产，共同共有是它的基本特点。这里特别强调“不稳定”，因为大部分历史时期是“社区共同共有”，是政府管不了或者是不管的，有的历史时期是“国民共同共有”，比如说 1958 年“大跃进”。现在有些情况下拆房、国家征地是不等价的，也类似于“国民共同共有”，所以是相当不稳定的共同共有产权结构。

社区的边界本身也不稳定，核心是社区公权或者国家公权对“出资人”权力的侵害。集体产权制一般的定义是共同共有的产权结构，但是我认为这种结构

不稳定。欧美国家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朝鲜有可能是国民共同共有，非洲、南亚一些国家是部落所有，可能连社区的概念也没有。

这个制度破坏了几个社会公理：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出资人对应受益人，谁出钱谁受益。盈利性资产本身适合按份共有，而不应该是共同共有。公益性资产适合共同共有产权结构。但是，只有这样一个公理不够，在公共领域，还要讲社区成员共有公共品的法则。我虽然不是出资人，但只要住在这个地方就要享受公共利益，这是一个平等公理。实际情况如何呢？外来的民工是不是能够享受本社区的一些公共利益？公益性资产，要形成一个排他性的消费圈很困难。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体育活动场所不让外人去玩，很多地方的排斥成分很高。

还有政治公理，居者有其屋。这一定和文明的程度有关系。我们国家现在才开始搞。而有的国家早就有了，并且随着政治文明的演化会发生变化。一般的住房资产要适应效率公理，也就是出资人对应受益人。

在我们的传统农村集体经济里，资产由社区成员共同所有，第一，退出的成本很高。我记得我们极端贫困的时候，农村亲戚就逃亡了，陕北向南有一片自生土，逃到那儿去开荒，三年搞好多粮食回家，全家人就活下去了。第二，社区共有资产不仅包括了经济学所定义的“公共物品”，更包括了经济学所定义的“私人物品”，这两点是传统集体经济最关键的特征。第三，社区共有资产的处置往往掌握在社区领导人的手里。第四，在传统集体经济的产权结构中，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交织在一起，属于私人物品的经营性资产所产生的收益，通常会被用来满足社区公共需求。另外，集体经济的形式包括：不易退出的股份；社区公权用投票方式决定的承包关系；高度稳定的承包关系；村干部事实控制的承包关系；“两田制”；变相取消承包制的“反包权”等。

其次，传统集体经济制度的危害有哪些呢？

一是负和博弈。公地制度的博弈特点是：全国的土地实际使用者，面对少数的公地使用监督者来侵占国家利益的时候，会产生掠夺公地的竞争。

也许大家不熟悉农村的情况，周边的土地如果都是公地，大家要想办法侵占，私人有时候反过来会侵占国家利益。这是我们国家普遍的现象，最突出的特征是楼房的楼顶上盖违章建筑，以及农民盖“握手楼”。大量的土地实际使用者面对少数人构成的监管者，怎么保护土地？非常困难。在我们国家，侵占公地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的确和西方国家相反。一些欧美国家有公地，但公地的所有权不归政府，归私人，起码英国有这个情况。一个公园，大家要去游览没有问题，其实那个地不是政府所有，甚至是私人养护，但是用于公益。我们的情况相反，只要有机会能够侵占公地，绝不放手，所以这个博弈也很恐怖。

全世界都是这样，对于产权不清晰的东西大家就强占，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叫做负和博弈。多元所有的土地制度的博弈特点是：全国土地实际占有者彼此之间是监督者，公共部门成为仲裁者。这两种博弈完全是不一样的，注定要出问题。

二是国家土地管理行为扭曲。我们实践着“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用途监管”制度，其实是多重失效。在刚才的博弈格局下，监管的成本太高，土地公权职能无法独立。

什么叫做公共利益？它不应该理解成私人利益的集合，要理解成私人之间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性的问题或者是外部性的问题，而私人利益的表达也要置于公权的框架之下，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搞不清楚，这是我们国家的特点。要行使公权的时候，私人利益就起来了。比如说，我国奉行一户一宅，这个制度值得商榷。政府可以保证一户一宅吗？欧美国家哪个敢说每家都要有房子？在阿伯丁，政府给穷人盖的楼房一般是80多平方米，环境特别优美，其他的中产阶层要住那个房子是要掏钱买的。怎么能一户一宅呢？现在珠三角地区，这个就

把我们折腾够了。如果真的是一户一宅,真正的公共利益就没法保障。

土地规划失灵,产生畸形人口布局。私人利益只要合在一起就是公共利益,你要对私人利益规范就好像是要对公共利益下手,整个社会公权和私权边界在哪里?搞不清楚,造成一系列的土地浪费。我国有 150 亿亩国土面积,大概 1/3 适合居住,以 150 亿亩做基数我国的人口密度是比较低的,但如果以其中的 1/3 做基数,人口密度和荷兰差不多。简单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些官员所说的中国没有土地,所以就该住握手楼、几十层的塔楼。未来中国能不能做到 4 亿个家庭,其中 1/3 是专业农民,2/3 是逆城市人口,3 亿家庭住城市,2 亿家庭有独栋房子,如果没有就是失败。有人说主要是土地问题,但是我说土地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三是公权不当干预私权。类似于乌坎这样的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即使是实行民主制度,乌坎事件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法律决定 2/3 投票表决通过,就可以变更所有人的土地承包权。这是不行的。基本财产权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变更。

四是“社区成员合理性无解”难题。现在最大的问题,即“探索集体经济成员权资格认定”,这个事情基本上是无解的。为什么?如果是公益性资产,就要实行共同共有的产权制度,谁住在这儿谁就是成员,是当然成员。我问过丹麦人一个问题,外面的人突然带个孩子在你这里读书,没有在这里纳过税,你会不会让他读,会不会另外收费?他想了半天,说这个好像不是问题啊,当然要让他读书,当然要他的孩子和别的孩子一样。我想说的是,只要住在这个地方,哪怕昨天不是这儿的居民,今天是,从文明的准则来讲就要享受公益性的资产或者是公共利益。

经济组织是另外一个组织,你是不是出资人?如果不是出资人,不给你入股。基层的领导都知道,我们是非出资人也要分股,不管是外嫁女,或者是招的

女婿,或者曾经是后来不是了,后来又回来了,诸如此类的问题特别多,全国从南到北都是,西方国家也有,但是原则很清楚,公益性的项目以住在这儿为主,你要分红的话那你一定是出资人。我们现在就搞乱了,所以没有解,需要不断探索。

五是分配关系扭曲。既造成了私人物品分配的平均主义,又破坏了共同体分配的普惠原则,产生了双重扭曲,不是出资人也给他分配,而住在这个地方又不给他福利,造成了外来人和本地人的裂痕。美国是儿童和老人的天堂,只要你的子女在那儿,美国签证的官员心血来潮给你签了就可以住在美国,哪怕刚到美国,也可以享受公益资产,因为你是居民。但美国哪一个社区都不会给你分红,中国的香港和澳门到年底给大家分一笔财政结余资金,这是很特殊的情况,因为他是当成了一个公益性的东西。没有按照出资人的原则,比如说谁纳税多就给谁分。只要你住在这,不论你是不是纳税人都给你分,按照公益性、公共产品的原则进行分配。

六是分红刚性。东莞就遇到一个麻烦,没钱分了还要分,这是产生基层负债一个重要的原因。

七是内部人控制或者是家族控制。珠三角地区很少有长三角地区那样的明星村,经济发达,物业贵,租金贵,分的钱就多。凡是明星村都有一个极大的内部人控制或者是家族控制。为什么?如果不是家族控制一定要有宗教,如果没有这个就撑不住,因为没有激励。

八是明星村的额外激励不可持续。有些明星村的领导人确实比较克制,得到的报酬是什么?就是各种荣誉。这里有一个逻辑问题,如果大家向你学习最后都得到荣誉,原来的明星荣誉就贬值了。所以说明星村的额外激励不可持续。

九是增加社会政治改革的难度。户籍改革复杂化,怕分红或怕不分红,国家无法建立基本的人户统一的人口登记制度。一个国家是需要人口登记的,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比较长,国家有一套人口登记制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在甲

地登记，在乙地为什么不给登记？我们的逻辑是怕分红，所以不给登记。有些人走了以后为什么不把人口登记变一个地方呢？他怕不分红，所以不愿意走。我们国家重大的基础管理问题，人户要统一，户籍登记和人住在什么地方要统一，这么大的国家这个问题居然解决不了。

我提一个很有争议的观点，中国已成为一个无社区的社会。社区是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无失德风险的公共合作群体。一般来讲，欧美国家跨出熟人社会一定是法律说了算，当然新加坡例外，它把道德原则也搞成法律。许多欧美国家的一些事情是没有法律规范的，有人违反了社区公共事务的准则，如果没有人起诉，法律肯定不管，如果产生冲突有人起诉，法官根据陪审团的意见裁决。大家历来都这样做，你不这样做就是你的问题，就可根据习俗来做出的裁决。我的意思是居民群体并不总是这样。很多人认为欧美人互相是冷冰冰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人和人非常友好，经常搞 Party。你在那些社区合法买的房，不出三天就有邻居给你送东西。跨出熟人社会一般是强制性的，要有公共准则，要守法，纳税必须要强制。熟人社会的成员数量通常在 150 人以下。但是在熟人社会，大家会自觉遵守一些公共的准则，遵守习俗。失德的风险是非常巨大的，遵守道德准则本身成本不高，你自己的汽车不能压你自己的花园，为什么？假定邻居要卖房，别人看到他的邻居花园糟糕成什么样子，就不买他的房子，这个房主就认为受伤害了，所以你的车不能压你自己的花园。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叫做社区，不是街区。我们当然是无社区的社会，因为到处都是公共的问题，不允许私人利益。从法理上讲资产都是公家的，没有私产，都要遵守强制性的规则。同时地产的实际占有者又想办法去侵占，所以中国的农村就到处是违章建筑。苏格兰的房子近距离看着有什么好？和农民的土坯房子差不多，就是干净、整洁，没有一丝一毫的违章建筑，角落

里面都非常整洁，成为世界著名的风景。我们的违章建筑到处都是，大家都要侵占，在中国要想找一个道德模范的农村太困难了。

自由先于民主，小公权才能放进笼子里。自由的问题没有解决，民主要推进非常困难。中国的产权制度要放在美国，美国的民主立马失灵。国家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个笼子一定不能做得太大，笼子做大了就不牢靠了，监督成本太高，要把公权做小才有可能做一个小笼子，才能牢靠、结实。产权改革不到位，民主政治就难发展。

十是置农业以危险境地。中国大概只有水产、花卉和一部分水果在全世界有竞争力，其他的农产品基本上没有竞争力。前几年河北的一个副县长跟我讲，现在河北省某一个县的农民已经不种小麦了，只种一季玉米。农民算来算去种一季玉米最划算，种两季不划算。不能怪农民，农民有农民的算盘。为什么？中国农业灌溉的技术路线很复杂，旱作农业在我们国家是可以采用的，但为什么我们不大力推进旱作农业而要搞灌溉农业呢？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集体经济制度和灌溉农业容易配合。河北出现那个情况是因为那个县的农民自主性比较高，一家农民放弃种植小麦，最后在市场的影响下大家都不种了，反过来形成要搞旱作农业的压力，这样农业成本就能降下来。灌溉农业的成本非常高，其中重要的不是水的问题，而是环境的问题，包括灌溉本身劳作的时间。农民 $1/3$ 的时间用在放水，因为放水是要守着的。我们还做过一些研究，如果现有的技术路线不变化，按照 WTO 的准则维持开放，主要粮食大概能维持 80% 自给，其它几大粮食品种就要靠进口。

有些人说没问题啊，进口美国的粮食相当于进口美国的水、进口美国的土地。我不大赞成。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国家很多方面是相当脆弱的，我们要支持国家的转型，尽量降低转型当中的不确定因素。如果在产权改革没有到位、中产阶级没有形成的情况下，贸然普遍推进民主政治改革，我认为会出现大问题。

最后，集体经济改革出路在哪里？

一是树立全新的所有权观念。我提出社会主义私有制，如果有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以这个为核心。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私有制？根据土地的公共性对私人的排他性权利进行多种限制，限制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土地是私有的，但是我对土地的用途给予很多的限制。这个做法就是社会主义和私有制的结合。但是我们要区别“古典私有制”与“社会主义私有制”的不同。现在西方国家没有古典私有制，也没有古典的资本主义了。我曾经访问英国农场，有的时候开个会议想找农场主找不到，为什么？谁也不敢侵犯农场主的权利，来了以后也没有意义啊，让他捞不到好处，所以干脆就不出来，只要守法，他也不在乎。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百公顷地，你的私地空间是一千平方米，别的地怎么样？法律规定种庄稼肯定要开放，如果不种庄稼要搞花园也要开放，别人可以进去支个帐篷呼吸空气什么的，但是不能打猎，因为很多猎物是你自己放的。中国的概念是什么？你有这个东西要围起来，公地都圈起来。全北京居然搞了五十几个高尔夫球场，印象中全部是圈起来的，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好像没有圈起来的，随便背个包包就可以去，办个手续就可以打高尔夫球了。我们刚好和人家相反，他们私人的地法律规定你要敞开，我们是公家的地还要围起来。所以我们的思想还有待改变。

二是改革办法，加快落实农地承包权长久不变政策。已经实行“股份制”改革的地区，在推进“政经分开”、股权“量化、固化”的基础上，实施“股份自由交易改革”。比如说我们三个人把别人的股份都收过来，收过来以后就容易对其资产分割，资产分掉了，集体经济就没了。当然也可以不分，搞成有限责任公司。但前提是量化、固化。量化、固化不做，意味着股份产权不清晰，没法交易。当然这个事情一定要慎重，要吸取俄罗斯的教训。比如广东南海是先让内部交易，长远的还是要放开，慢慢来，用五年的功夫把基础工作做扎实。

没有搞股份社还在搞承包制的要进行落实,搞了股份社的改革起来就更好。没有搞股份社直接实行统一承包制的现在遇到了大麻烦,江苏打算在现有的基础上搞承包制,政府原来跟农民说的是三十年不变,等于告诉农民三十年以后可以变。三十年后怎么变?当然是根据人口变。所以我是不赞成在现有的基础上搞永久不变的承包制,我认为这样会引起全国的大规模社会性矛盾。成都的综合改革应该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我去了以后不乐观,搞得又开始分地了。我没有地,你有地,现在要永久不变,怎么办?搞一个不平等的分地。国家搞土地规划,把农地给定死,农地不值钱。在农地不值钱的情况下,多几亩地无所谓,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没有出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土地值钱?因为土地有可能转成建设用地。如果把这个卡死了,农地就不值钱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的改革看能不能推进。我觉得改革没有特别关键的奥妙之处,观念转变,靠交易把集体打散,把承包权做实,把所有权厘清。

刘宪法 刚才党教授的精彩演讲让我们有很多启发。围绕这个话题我想讲一些想法,和党教授的视角不太一样。想理解集体经济这件事的切入点要看农村和政府关系。在传统农业地区,农民和政府打交道基本上就是三件事儿,第一件事是计划生育,第二件事是批宅基地,第三件事是一些特殊的粮食大县的播种面积。如果有良心的政府再管点水利,管点饮水工程,管点道路。这是政府做的事。再有点良心的政府就管筛选良种、畜禽的防疫。

其实在大多数传统农业地区,农村和政府关系很简单,挺平静的,没有什么矛盾。可是有一些非农业的农村,说是农村但没有农业,农业比例已经很低,务农的人也很少了,自称农民的实际上是生意人,这种地方问题是最多的。为什么?这就牵涉到征地问题。一有征地就会产生问题。据我调查研究,当年征地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不断地征,年年征,这时